

■ 学人素描

王巍: 亲历中国并购市场风雨云霓



◎ 倪小林

王巍的人生因为太繁杂而匆忙,他总在为中国并购的事情忙碌。采访赶上他正在处理两个项目之间的空隙,只好在他返回单位又上路的车上进行采访。和王巍早年认识时,他的投资公司刚刚创立,如今他从操持一家公司并成为并购行业协会的会长,穿梭在海内外并购市场,摇旗呐喊,看上去真的很忙。

成功是因为有失败垫底

很多撰写王巍文章的人对这位倾全部精力于中国并购事业的人,有过很多称呼:“并购教父”、“中国并购第一人”等等,我和他交谈后,感觉最为强烈的不是罩在他身上的这些耀眼称号,而是他苦心为中国并购事业呐喊,在困境中坚持的精神。

他告诉我,自己的成绩被人写得很多,其实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那走麦城的那些岁月。

没想到这位看上去精神气爽的人物,还喜好悲剧人生。他很认真地说,做成一件事情真的不易,并购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从无到有,发展到今天,自己还能坚持下来,是因为有无数次失败没有打倒我。他讲起当年在东北的一个城市建立证券营业部的经历,主要是代理理财数额很大,出现亏损后总经理跑了,几个业务经理也跑了,董事长也辞职了。我曾在早期担任过这个公司的法人,尽管从来没有管过这个企业,出了问题,政府就找到我。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我袖手旁观,一旦崩盘之后,问题将相当严重。只有自救才能获得社会的救援。我立刻从北京飞过去,在那里住了一个月,表示了与大家共命运的决心。同时,我四处寻求希望收购营业部的机构,给员工以未来的前景。大约四个月后,这个营业部进入了较为正常的状态,尽管没有解决全部问题,至少避免了崩溃,赢得了进一步重组的时间。

王巍不断讲起自己走麦城的故事,由于自己的经历养成了对失败者的关注,中国那些消失或迷茫或失败在商业大潮中的知名企业家,他几乎都能完整讲出他们的故事。

我终于明白不久前他和他人合作著作,书名定为《崩溃》的原因了。在他眼里一个不知道危机的人事业难以长久,一个不知道创业艰辛和痛

苦的人可能会迷失方向,一个珍惜失败经历的企业家能崛起是难得的社会财富。王巍之所以在市场大潮中沉浮跌宕,是因为他从不回避失败。

一次偶然机会知道王巍喜好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作品,这样对于理解他倾向研究失败和危机问题就不难了。因为,这位世界知名作家总是以悲剧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在他的《人类的群星闪耀》中他告诫人们的是拿破仑、林肯总是失手在看上去不显眼的危机上。王巍研究企业并购到深入研究企业,也以同样的目光透视出企业危机密码。在他眼里企业危机不过是一种常态。

坚持契约精神不是赶时髦

话题从危机入手很自然地提了一个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王巍凭借他多年的实战和研究认为:重新学习!

今年在中国并购市场发生过的重要事件,王巍一以贯之地加以关注,他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对达娃之争谈到了自己的看法,以为一个企业不能输在规则上。

我在采访他的时候,离他发表中国企业要尊重契约精神的言论已经很有半年之久,我知道他是用自己的研究和经历提示,中国企业进入世界经济体时间不长,对于国际市场并购的规则需要更多的了解。但是,当我再次提到这个敏感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我。我明白他在“达娃之争”问题上的态度,引起一些人的非议,认为在外资并购中资的时候,多是国外资本和我们比较是“强对弱”,而不是什么规则问题。

但王巍最终还是正面回到了我的问题上:我曾经谈过一个观点,我们在并购领域是三十年代的基础,有六十年代的手法,换九十年代的眼光”,这是他研究全球并购之后的体会。其理由他说的很明白,美国经过三十年的两次并购浪潮达成了现代产业经济的基础设施,而中国则用了大体十五年的光景用市场交易和计划分配的两种机制基本造就了这样的表面相似的环境。但并购操作的手法基本处于多元化集团的组织与整理,更专注管理职能和控制权利的把握或转移,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产业链的形成很多企业还是处于讲故事阶段。”王巍不客气地指出我们现阶段企业并购时的普遍心态。

全球浪潮来了,我们能否回避那些市场规则问题?在前不久的天津中小企业国际融资论坛上,王巍还是很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并购领域信用是通行证,你不讲信用,我可以不和你做交易,这是市场选择的魅力,那你找不到对手就只好自己出局。显然,王巍从在美国留学时就接触了并购案例和实战研究,市场经济倡导的契约精神对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告诉我,加入WTO之后中国并购市场的最大挑战是要融进去和按规则办事。目前,我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以后,大量的企业并购不断发生,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57%是通过并购完成的,王巍此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提出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同样值得重视。事实上,在并购市场里我们的企业因为不了解国际市场规则,不精于法律研究吃亏上当的案例很多。

正因为他深知其中之艰难,也就很唯物地看这个问题:企业的产业整合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需要一代人到两代人的努力。你什么时候进入整合,又是第几棒呢?这是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考验。”

在王巍眼里,并购市场是丰富多彩,也是非常现实和残酷的。

与中国并购市场一起成长

今年,是王巍很有成就感的一年,国内投资界关注的天津国际融资博览会召开了,给他这位“红娘”莫大的欣慰。美国企业成长协会(ACG)在奥兰多举办的并购交易年会上,他应邀进行了中国并购市场的讲演,获得全球投资界的强烈关注。协会主席和几位董事和他座谈时,他建议将这样的大会搬到中国来,到会者当即表示极大的热情。

这就是今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国际融资会议。王巍进一步阐述:我想这个形式会成为中国未来一个重要的国际融资平台,成为常设会议。

中国的并购发展与改革开放共生,从无到有,从引进外资到资产并购,从合资经营到产权融资,到国际投行和PE进入,王巍亲历并参与了几乎整个过程。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目标,抓大放小成为当时改革的重点,这预示着企业之间的兼并将成为热点,已经熟悉海外市场和并购业务的王巍更是敏锐感到这一重要的经济战略目标的实现。

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是并购市场的雏形。1980年代在海外留学的王巍,面对世界风起云涌的并购浪潮,他着迷地研究其中的奥秘。我在美国最大的兴趣就是关注各种并购活动,当时我就发现并购活动可以带来财富的迅速增长。

他回国后于1992年任南方证券副总裁,一上任就成立了并购部门,那也是我国第一家证券机构专门为并购成立一个部门。但是毕竟人们对于企业兼并的方法还是很陌生。最后,他决定从最基础工作做起,写文章讲概念。他很认真地介绍,我通过研究把当时流行的“兼并”一词修正为了“并购”。仅在并购方面他就著书十几本,还办起了并购年鉴名为《中国并购报告》,有全球并购研究所学术委员、金融界专家学者、并购业界(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投资银行等)著名人士加盟编写。

在1997年,王巍毅然选择了下海实践,并于1998年创立了“万盟投资公司”,致力中国的企业并购。一系列的案例在他奔波下成功运作,如盼盼集团在万盟帮助下由原来的乡镇企业改制为私营的有限责任公司等。2001年中,他主编中国内地首部并购

行业年鉴《中国并购报告》,又发起成立“全球并购研究中心”。随后,组织出版并购周刊,创建“中国并购指数”,还建立国内第一个并购专业网站“中国并购交易网”。2004年他担任了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一职。

此时,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全新的领域。随着并购在中国的深化发展,王巍的研究视线也从实战转向了并购时代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中国并购市场的发展等更为宏观的经济全问题战略研究。

在王巍的研究成果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他领头编写的《中国产业地图》。在编辑此书之前他翻阅了一套十七卷精装的《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他介绍:这本书记录了战后至1970年代末期日本的通商产业政策,对日本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产业政策制定背景、政策确立过程、组织实施,以及实施后的效果和作用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希望国内的专家也能脚踏实地的编写一本这样的史书。王巍认为,一国经济如果没有这样的产业史录,将是经济大国的缺憾!

王巍又一次做了自己希望做的事情。

■ 本期人物话语



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影响不大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近日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受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影响,明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但这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

■ 多声道

确保央企控股公司股改顺利完成

李伟(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日前在“中央企业产权管理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尽快研究解决央企所控股的未股改上市公司、有退市风险上市公司以及绩差公司发展中的问题,确保所控股上市公司股改工作的顺利完成,提高央企的整体运行质量。当前,部分央企的产权管理还存在基础工作比较薄弱、产权链条过长、扩张冲动明显、产权转让改制程序不规范、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因此,央企要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加强对所属企业产权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工作,重点抓好进场后产权交易的规范操作和产权登记、资产评估等基础工作;要按照国资委提出的关于减少管理层级、缩短投资链条的要求,提出本企业产权关系调整的总思路。

尽快完成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佐利克(世界银行行长)11月20日在世贸组织总部召开的“全球贸易援助审议会议”上说,多哈回合谈判如今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谈判各方均面临很大的压力,但各方不应只看到压力,也应考虑一下利害关系,考虑如果因目前的分歧而导致全部谈判失败是否值得。尽管多哈回合自6年前发起以来屡经挫折,但谈判还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如今一项完好协议的要素已经具备,只要各方表现出政治意愿和勇气,那么这项协议就能达成,多边贸易体系也将得到持久的改进。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需要尽快完成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因为达成一项新的全球贸易协议对帮助穷国脱贫至关重要。

国资可借股市战略转向公共服务

孔泾源(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11月20日北大举行讲座时表示,由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庞大的国有经济,造成了目前中国有经济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是庞大的国有经济要求保值增值,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不需要这么庞大的国有经济占领市场,而且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事业长期发展滞后。中国在经济领域中的下一步改革任务仍然是加大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的改革力度,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通过资本市场,将国有资本从生产领域转移到公共服务领域。

将继续实行油价和国际价格最终接轨

陈德铭(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近日在接受凤凰卫视中文台《问答神州》专访中谈到,现在要继续实行和国际价格的最终接轨,是我们一个长远的价格改革的目标,但实现这个目标还要考虑到目前的现状:第一,现在中国国内的市场竞争还不充分;第二,我们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还比较弱,所以,我们准备采取逐步的方法,看国际的走势,再看我们自己的消化能力,逐步走,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即便这样走的时候,我们对低收入的人群和承受能力比较差的部门还是要给它一些扶持,让它能够过好这个关。

■ 来自日内瓦

美元贬值正在显著抑制全球消费

◎ 徐千惠

上周末,笔者陪同到欧洲旅游的几个中国朋友在瑞士和法国逛了两天。一路上,他们的惊讶声不断,天哪,美元换瑞士法郎这么少,少买半块手表了”、“现在的欧元怎么这么贵,看样子还是不买GUCCI包了”。一开始,笔者并不在意,但后来想想他们其实是弱势美元的直接受害者。

就在上周,有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弱势美元给中国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带来压力,由此引发了市场的诸多猜测,中国将可能会调整外汇储备结构,也增强了市场对美元仍会持续走软预期。

那么,美元持续走软会对全球消费增长及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人们关心的一个话题。

其实,美元走软对抑制全球消费增长的影响是相当显著的,本文开头中国旅游者的一些担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全球范围内的许多家庭都偏好于持有美元,此轮美元暴

跌造成了他们的财富损失,美元贬值对中国家庭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对中国家庭而言,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但对欧元等其他币种却贬值了,当大多数家庭持有外币仍以美元为主时,到欧洲等地出国旅游,他们仍需将美元兑换成欧元或其他币种,也真实地感受到了美元贬值带来的财富损失。同样,瑞士家庭也面临这一冲击。例如,美元兑瑞郎由1年前的1.25水平变为目前的1.11水平,持有美元的许多瑞士家庭在1年时间内的损失超过了10%。

美元持续贬值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一种反应。从经济学分析来看,美国长期以来积累了巨额贸易赤字,这必然会导致美元贬值。同时,近期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对美元疲软走势的影响更是“雪上加霜”。与5年前相比,目前美元的贬值幅度已超过了40%。当然,一些出口导向型国家的亚洲央行调整外汇储备中美元比例,可能是影响美元贬值的因素之一。但是,目前一些石油出口国也开始增加

欧元在其外汇储备中的比例,这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当然,美元贬值不仅让全球消费者感受到了压力,对美国消费者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美元贬值导致国际大宗商品尤其是国际油价的持续上涨,而美国又是一个汽车大国,国际油价由1年前的30至40美元一路上升到目前的接近100美元水平,这让当今的美国消费者“苦不堪言”。

或许,美元贬值让我们看到了,美元贬值必然会对当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有显著影响,但也暗示了当今全球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质变,即从围绕或依靠单一货币(如美元)或单一经济体(如以美国经济为主),逐渐向更为多元化的全球经济体在转型,这也包括将提升其他币种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

需要提出的是,亚洲国家货币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与影响在逐渐增大,尤其是人民币的影响和作用更是不容忽视。

■ 经济学术思潮追踪

瑞典学派理论贡献: 开创北欧社会福利模式

◎ 梁怡

瑞典学派(Swedish School)又称之为“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因其开创了以国家干预来实现“充分就业”和“收入均等化”的北欧社会福利模式而闻名,尤其是瑞典,被称为“福利国家的典范与橱窗”。与其对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贡献相比,它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巨大影响同样毫不逊色。

瑞典学派的思想可溯源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新历史学派和英国“费边社会主义”,但成形于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大危机,不仅让资本主义世界在痛苦中反省,而且经济学理论也借此契机而涅槃,其中瑞典学派便是新生儿之一。它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而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是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基石。

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来源于该学派创始人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积累过程原理。积累过程原理首先突破了此前经济学家普遍持有的“货币面纱”论,并试图将货币与实际经济结合起来,但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例如,该理论虽然强调了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却无法科学地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缺陷,另两位代表人物E.R.林达尔(Lindahl, Erik Robert)和K.G.缪尔达尔(Myrdal, K.G.)不断加以修正,从而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其中,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缪尔达尔则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从而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后来,他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得以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

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开端的要素禀赋理论是瑞典学派的另一支柱。1977年诺奖得主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以及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塞尔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即著名的H-O模型。

H-O模型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而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谈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不能不提昂惕夫之谜和林德伯的需求相似理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昂惕夫之谜当然已不再是一个“谜”,但其对人力资源重要性的揭示功绩却为人们所铭记。而林德伯的需求相似理论尽管仅从人均收入角度来说明一国需求结构而有失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弥补H-O模型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

瑞典学派的大部分学者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尤以R.A.林德伯(Lindbeck, R.A.)的研究为主。

林德伯的混合经济理论是针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新左派思潮而提出的,主要内容是: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他反对把经济理论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而主张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据此,他又进一步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

总起来看,发展到今天的瑞典学派具有这样几个鲜明特点:一是瑞典学派把货币的变动与经济的变动二者结合起来,首创货币经济理论;二是倡导动态经济理论,以弥补静态经济理论的缺陷;在经济分析的方法和工具方面,编造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术语和经济范畴,以完成动态经济分析,倡导把一些经济变量如资本价值、所得、投资、储蓄、成本等区分为事前、事后两种数值;三是将预期纳入到经济分析之中,强调预期在经济运行中“决定性”作用;四是偏重于纯理论的研究,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五是注重国际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

瑞典是一个高度开放型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很深的国家。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从国情出发,对国际经济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取得了相当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且本来就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中国有极大借鉴意义。